

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

徐亮 苏宏斌 徐燕杭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ON LITERARY REASON

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

徐亮 苏宏斌 徐燕杭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研究计划成果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论的现代性与文学理性 / 徐亮, 苏宏斌, 徐燕杭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8
(求是文库)
ISBN 7-308-04417-3

I. 文... II. ①徐...②苏...③徐 III. 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4032 号

出品人 蔡袁强
丛书主持 陈晓嘉 李海燕
责任编辑 孙秀丽
装帧设计 氧化光阴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340 千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417-3/I·155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引论 当代文艺学在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上的困境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中国当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观点概述	4
1. 理性优先论	4
2. 非理性优先论	8
3. 折中论	9
三、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与文论现代性	10
1. 启蒙话语	11
2. 思辨理性	11
3. 审美性	12
4. 自主性(自律)和专业性	13
四、讨论中存在的学理问题	15
1. 忽视学理逻辑的建构	15
2. 自相矛盾的概念使用	16
3. 自说自话的理论发挥	17
4. 不同概念的混淆	18
5. 对哲学家、美学家及思想流派归类上的混乱	19
五、推进文学理性问题研究的两个层面	20

第1章 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理性与审美的关系

一、“我思故我在”——认知理性的确立及其与感官的对立	24
二、神的完善——本体论构架及认知理性的权威	28
三、感性的完善——美学能够进入形而上学的殿堂吗	35
四、美即快感——审美中的个体优先性及理性的放逐	42

五、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小结·····	49
六、美是德性的象征——从理性与审美关系的角度反思康德的批判哲学··	51
1. 理性的构成与审美原则的二律背反的解决·····	52
2. “美是德性的象征”——审美活动在理性体系中的价值·····	59
3. 理性与审美:批判哲学的启蒙主义诉求·····	66

第2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及其对美学—文学的影响

一、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理性观·····	71
1. 逻辑实证主义·····	72
2. 批判理性主义·····	74
3. 历史主义·····	75
二、唯意志论哲学的理性观·····	78
1.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	79
2. 尼采的强力意志论·····	82
三、生命哲学的理性观·····	87
1. 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	87
2.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92
四、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的理性观·····	95
1. 现象学的理性观·····	95
2. 存在哲学的理性观·····	98
3. 解释学的理性观·····	105
五、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	108
1.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108
2. 法兰克福学派对新理性观的建构·····	110
(1)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	110
(2)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113
六、后现代主义的理性观·····	115
1. 福柯·····	116
2. 德里达·····	118
七、小结·····	121

第3章 基本概念的清理

一、理性主义·····	128
二、非理性主义·····	130



三、非理性	131
四、理性	135
五、感性与情感	141
六、直觉	143

第4章 理性的命运与文学对理性的需求

一、理性的转折与理性在文学中的命运	146
1. 抗拒理性:文学现代性的普遍诉求	146
2. 理性—合理性关系的转折与理性的命运	148
3. 理性—合理性关系的转折与文学对理性的关系	151
二、文学为什么以及在哪个意义上与理性相干	154
1. 文学的思想功能和作为活动的文学	154
2. 理性的上升功能与想象力的上升功能	158
3. 理性的看护功能:康德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	162

第5章 文学理性

一、文学理性的可能性	168
1. 理性的可区分性	168
2. 恢复理性的宏大力量	170
3. 接受的理性	173
4. 审美(文学)作为形而上之思的惟一合法领域	176
二、文学理性不是什么	182
1. 文学不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	182
(1) 柏拉图的诘难	182
(2) 皮科克的诘难	187
2. 文学理性不是合理性或形而上学理性	191
(1) 布瓦洛与利文斯顿:合理性支配下的文学	191
(2) 德里达的在场与隐喻及其对文学理性所构成的质疑	195
三、文学理性是什么	215
1. 爱德蒙森的指控	215
2. 文学的认识论	217
(1) 小说的智慧	217
(2) 对“傻”的发现——文学理性的批判功能	219
(3) 局限的认识	224

(4)有所看护的知识	228
3.文学的操作理性.....	239
(1)看护下的操作	239
(2)文学的操作理性及其工具性	241
4.文学理性的实践意义.....	245

后 记

引 论

当代文艺学在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上的困境

一、问题的缘起

理性-非理性历来被当做一对哲学概念,但它们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哲学家的身份,抱着与诗人一争高下的决心,提出诗由于与理念世界隔了两层,因而不真实的结论。这意味着诗不是一种理性活动。但是在柏拉图别的对话中我们也可发现一种与此相矛盾的看法,即认为诗可以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当诗人陷入对上界和理念范本的回忆时,接近真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诗是与理性相符的;但这时诗人却处于一种精神上的迷狂状态,这就意味着他是不清醒的。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既揭示了“理性”概念的奇特命运(从清晰性来判断和从终极来源来判断的不同后果),也预示了后世在文学与理性关系问题上的纷争(文学是理性的和文学是非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从理性入手来论证文学的合法性。在他看来,文学除了具有感性乐趣外,本身也是一种类似哲学的认知活动。他把文学同可能性与必然性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中的一些不可能之事可以用“理当如此”加以解释,以使其成为可信的,实际上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亚里士多德无疑把文学看做一种必然含理性于自身的艺术活动,而且他所涉及的“理性”更多的与认知相关。亚里士多德以后,理性始终是文学的合法性根据,一直到近代认识论哲学和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影响文学理论。

在现代思想背景下,文学不再热衷于从理性方面寻找合法性,相反,它常常认为自己不属于理性活动范畴。这首先是因为出现了分界的冲动。按哈贝马斯,马克斯·韦伯赋予文化现代性这样一个特征:将一个统一的宗教形而上

学世界划分为三个领域——科学、道德、艺术,并使每一领域专业化和制度化^①。这种分界导致与文学定位有关的后果:理性不再是一个统一世界的基础,而是被分配到其中的一些领域,例如科学和道德领域;文学则由于隶属艺术,其合法性基础有所转移。鲍姆嘉通提出“感性的完善”说,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和审美活动是触及最高的完善的,但途径不是理性,而是感性。按康德审慎而精确的命名,人的审美所依赖的是有别于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另一种功能:判断力。黑格尔试图把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却遭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艺术家的激烈反对。现代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反对理性和理性主义,除了固守艺术的自主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代科技理性无往而不胜的统治势头的反感。由于上述分界,理性具有了它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所有的负面特征。文学表示出对单一的技术世界的前景的担忧而与理性划清界限,这也使文学与理性的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局面。20世纪开始的语言学转向,似乎把文学理论的注意力完全移离理性-非理性问题,而全力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诗的言语特征和话语成为艺术的原因(穆卡洛夫斯基,雅各布逊),叙事作品营造神话的方式(罗兰·巴尔特),稳定的意义世界的解体(德里达和解构主义),以及各种话语在文学中行使权力的机制(福柯及其影响下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是些语言-话语层面上的问题。但如果注意到这一整个转向都是在尼采反理性主义思想背景下的行动,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理性-非理性这对哲学概念的隐性的基准作用。

当代西方语境中对理性问题的关注被取消了吗?文学与理性的关联被弃置不顾了吗?当海德格尔揭露形而上学把存在变成了在者,当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呼吁恢复诗意的思以及用艺术拯救时代时,透露出的既是对理性被哲学化从而失去其应有力量的不满,又是对当代技术的世界“座架”内思想的失落的不满。在这双重的困境下,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诗歌与艺术恢复思想和理性的尊严,这不是偶然的。以反形而上学为己任的现代思想家,例如德里达,尽管对文学陷入某种“形而上学的阅读方法”的可能性充满警惕,但他正是通过一种写作——这种写作融文学与哲学于一身,他的奠基作《文字学》实际上就是《书写学》或《写作学》——把他的解构智慧充分展开的。德里达反对形而上学理性,但他的理性运作于与文学十分相似的一种特殊写作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许多人把矛头指向理性时,为什么不想想理性思想史上可能存在的问

① 参见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一文。中译文可参见王岳川,尚永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4页。

题?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形而上学对哲学话语的占有问题?这种占有破坏了语言原有的丰富性,抹杀了包括“理性”在内的所有词语的可创造性,把它们变成固定不变的定义条文,从而耗尽了理性原有的包容性。

让我们再转而关注中国。中国古代文论的情与理之争虽然没有更多的哲学背景,但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艺学进程中,文学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基础性话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文艺理论讨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伤痕”文学涉及的是人情味和文学的情感特性;朦胧诗的争论中,各种观点经常援引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作为自己立场的根据;关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的争论焦点,是荒诞、超常规现象的意识属性和合法性;文学与政治、道德的关系问题讨论,主张两者分离的一方指出文学是外于理性的,因而与政治、道德理性有本质的区别,主张两者不可分者则强调文学负有政治、道德责任;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提出了新理性精神的主张;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相对理性也一直是一个基本话题。这些争论,有的直接论及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大部分则是间接地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遇到了特殊困难(我们在后文将展示这些困难)。这使得这一问题虽然极显重要,却由于这些困难而不得被搁置起来。同时,各种后现代主义热点的相继涌现也冲淡了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不过有两点理由使我们对这一话题重新产生兴趣:首先,这似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文艺学话题,对文艺理论史的清理绕不开它,文学的合法性论证绕不开它,即使在后现代层面上讨论艺术与文学问题也绕不开它,因为后现代意义上的主题都充满了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敏感。这使我们今天的文艺学讨论不断地触及这个基础,80年代以后我国文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绵延不断的讨论就是一个明证,而借此清理一下整个讨论的得失将有利于深化这一主题。其次,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后现代平面上找不到坐标,无处可扎根之时,理性向我们显露出它久已湮没的一面,它的宏大的力量。这一面的揭示将引起我们对理性的重新思考,使我们得以在缺乏方向感之时重建信心。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将面对文学理性。对“不可言说之物”(利奥塔)、“终极悖论”(米兰·昆德拉)、“彼岸”(康德)的冲动并没有因为形而上学的名誉扫地而销声匿迹,它一再刺激我们,要求我们正视它的存在(一种不同于人类检测标准的存在),感知它强大的能量。它使我们再次意识到,人们的知识欲望、审美冲动实出于这一能量,理性并未耗尽它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如果我们把它定位于哲学认识论概念,只在乎它的工具性,那它也许无法摆脱被形而上学化的命运,但如果它被重新赋予原属于它的宏大力量,则它的新的可能性还只刚刚开始。这第二个理由给予我们某种希望,文学有可能因此摆脱它仅

仅作为语言游戏的场所(像某些后现代言论所断言的那样)的地位,而成为对抗形而上学,“揭露存在的被遗忘”(米兰·昆德拉语)的场所,成为一种充满意蕴的言说方式,一种存在的方式。尤其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此把这个庞大、复杂甚至充满危险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加以清理、发掘和讨论。

二、中国当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观点概述

我们首先从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理性—非理性问题的学术讨论开始。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思想和文艺学观念的剧烈变化,西方现代文艺学思想大量延入,“非理性”、“反理性”称谓广泛出现。与之相适应,文学和文艺学中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也一再受到关注。由于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巨大社会效应,以及这一问题对文学的根本性意义,讨论超出了文学范围。国内几乎每次重大思想文化思潮的涌动都牵连到这一问题,如 80 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和 90 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上文已提到,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并不总是单独提出的讨论焦点,但它是很多讨论必然包含的一个背景或涉及的基准。80 年代以来,与此相关的讨论涉及面包括:文学中的情感、想象、直觉、无意识、下意识、领悟、灵感、荒谬性、非自觉性、错觉、幻觉及非理性问题,以及这些概念与它们二元对立组中的另一端——理性、意识等等的关系。文学主体性、审美反映问题的讨论也对理性—非理性概念涉足颇深。

这些讨论的背景和诉求虽然相当复杂,但其焦点或提法都可以简约为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理性的、感性的(或非理性的)还是理性与感性(或非理性的)统一的,以及这样判断的理由。当然我们有时可以看到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文学应该是理性的、感性的(或非理性的)还是理性与感性(或非理性的)统一的。很明显,后一种提法只是表达更强烈的主观愿望的方法,其论证方式和涉及的内容与前一种相似。

根据对文学的理性—非理性性质的立场,我们可以把有关的讨论概述为以下几种观点。

1. 理性优先论

这种观点通常肯定文学对情感和人的表现,但抨击非理性主义文艺观,认为应当在文学中提倡理性精神,并且证明文学活动中意识运作的特点实际上是理性的。无论从持有人数、所拥有的发言场所、论文的数量和密度,还是从论者在学界的权威性看,这都是一个主流观点。



这一观点的集中出现,都与我国当代文化、文学思潮的热点讨论相关,表现了强烈的价值取向和争论态度。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针对人道主义思潮而出现的对文学的情感特征的讨论;针对西方当代文艺思想大量涌入而出现的对文学创作无意识论、直觉论、自然本能论、幻觉论的讨论;对当时报告文学的强烈社会效应而引发的主张文学启蒙精神、倡导社会学批评的讨论;90 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的新理性精神问题的提出,等等,均是这种观点显示的主要场合。

具体说来,按其对于非理性(包括直觉、无意识、下意识、灵感、非自觉性等意识现象)的容忍度,可以分为两种。

1) 强调文学的理性性质,不承认文学的非理性特征。许明一直坚定持有此种观点。在 1986 年发表的《理性的自由——文学主体意识界说》一文中,他对文学主体性问题提出见解,认为应当积极肯定文学中主体意识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的审美意识由于用形象和情感来进行,因而是朦胧的,不清晰的,但其指向是真理,而且因强烈的情感判断可获得至善境界,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进入到高级精神阶段才能达到的理性的自由。审美快感正是这种理性自由的表现,是审美活动必然产生的主体意识状态。“它不是所谓直觉式的、非理性的、不可分析的。相反,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我们的科学探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举例说,“只有进入那种高级的理性活动境界的人,才能体会到(贝多芬)那音符内含的振奋人心的力量”。^① 许明对理性寄予厚望,后来在 90 年代中期,针对商业大潮带来的物欲至上、人文精神失落现象,与钱中文一起提出建设“新理性精神”。他给“新理性精神”的定义是: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吸收我国 80 年代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成果,吸收 19 世纪以来西方的所有思想成果,特别是文化理性主义和文化哲学的成果,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为核心的理性。^② 按他一直持有的观点,文学应当而且能够负起倡导“新理性精神”的重任。陆贵山在这一点上观点也很鲜明,他抨击 80 年代出现的“文艺的非理性主义”主张,认为它们提供的形式是夸张、病态、畸形的。他把对潜意识、原始欲望(性本能等),以及偶然性、神秘感、宿命论的表现都归于这种“文艺的非理性主义”,陈述其危害性。他指出,不能把艺术中的感觉(艺术直觉)理解为这种非理性的、不自觉的低级意识活动,因为,按马克思的见解,“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总

① 许明:《理性的自由——文学主体意识界说》,《文学评论》1986 年第 5 期。

②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 年第 1 期。

之,要使艺术与非理性划清界限。^①

不过,在理性优先论中,持这类直接排斥非理性现象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少,更多的人属于第二种,这也是更易于为多数人接受的主流观点。

2)适度承认文学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但将它解释为属于理性的,赋予其理性的本质。文学中是否存在情感、想象、直觉、无意识、下意识、领悟、灵感、荒谬性、非自觉性、错觉、幻觉及非理性因素,以及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及其作用,是这种观点面对的主要问题。这种观点一般承认上述各种理性外现象在意识中特别是在文学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肯定了其有益的作用,但作了理性化的解释,或强调要以理性加以控制、改造、升华或涵盖。例如钱中文对艺术直觉问题的解释。他把与艺术有关的直觉分为第一印象、顿悟、形象的直接透视力三种,承认它们对创作有重要价值,但不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除了顿悟有“非自觉性”(但实际上还是“无意识状态中的知识、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智的闪光”,即还是具有理性实质)外,其他均属艺术创作中的自觉行动,没有非理性、非自觉性的特征。^② 钱中文在90年代中期提出“新理性精神”时,对非理性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指出非理性是“人的心理、认识的重要一面”,非理性主义有“拓展艺术创造的机遇,更新人们的艺术思想”的功用^③,继而又从文学是个人的情感活动出发,表示文学可以描写“非理性的行为与行动”,因为“个人的独特的命运往往总是以偶然的非理性的形式出现”^④,但告诫说,非理性主义实际上总是走向“无所顾忌地否定一切”的悲观主义立场,因而应予反对。^⑤ 黎山峒在总结创作非自觉性实质时,承认创作中潜意识、直觉等的重要作用,承认它们可以不经逻辑推论,但解释说,由于这些心理现象来源于社会实践,所以实质上是理性的。^⑥ 王庆璠把无意识现象解释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表现,认为无意识虽未达到意识的阈限,但作为精神活动,并非超意识,故与意识无本质不同。^⑦ 刘烜特别注意从整合的全面心理机制上来解释创作灵感问题。他的解释是,由于有长期复杂的酝酿过程,灵感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刻理性^⑧。

① 陆贵山:《对文艺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审视》,《光明日报》1990年4月12日。

②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39页。

③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④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⑤ 同①。

⑥ 黎山峒:《论创作非自觉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5年第3期。

⑦ 王庆璠:《论文学与无意识思维》,《文艺争鸣》1991年第3期。

⑧ 刘烜:《论文学创作灵感的整合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

王元骧、陶伯华致力于从学理上深入解释文学的情感、无意识及非自觉性问题。王元骧把文学解释为审美反映。审美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它是通过作家情感活动所进行的反映,但王元骧认为,情感是基于认识而产生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是产生情感的基础”^①,这就确保情感本身成了“对于客观现实的一种评价性的反映”^②。对于创作中的无意识,王元骧作了一种深入而特别的解释。他认为,现代西方无意识理论染上了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这是不对的。无意识心理与意识活动是互相渗透的。有一种作为意识活动成果的无意识,在创作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它的运作机制是:艺术家首先凭感悟获得直觉,这种直觉尚不深刻,尚需意识的审视。经过审视的无意识于是上升为意识,但这还只是整个创作过程的中途点,艺术家应努力使直觉到的生活内容,“经过理性加工之后返回到无意识”,从而达到创作活动的“化境”,这样才能使创作成为自动的,由衷的。^③ 陶伯华用一个复杂的心理学模式解释创作迷狂、灵感等非自觉性现象。他指出,这些现象都首先来自信息刺激所产生的电—化学模式,最频繁的刺激反应形成敏感的神经通路,使某些联系具有最大信息量。人则通过社会实践重复它们,塑造出特有的神经元之间的组合结构。可见,它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这种神经元之间的组合结构比早先的电—化学模式反映的信息联系更稳定,形成逻辑范畴。信息加工过程是,将从外界接受的非约束性信息与已结构化的约束性信息相互作用,由后者对前者加以组织和同化。约束性信息增多形成理性认识。在文学创作中,此种以非自觉的本能的方式起作用的理性认识与艺术形象发生共鸣,使作家感到迷狂状态,而它有规范人的情感思维活动之功用。陶伯华的结论是,正是理性的信息处理过程形成了无意识的心理结构,迷狂状态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理性。^④

另一方面,一些将文学视为启蒙武器的学者也极力主张文学的理性精神,从理性功能的角度论证文学的性质。何西来在一篇有关报告文学的分析文章中,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它们表现了“新的启蒙理性”。鉴于报告文学属于文学范畴,何西来试图通过赋予这类报告文学以审美性来使其拥有文学的合法性,他论证道,理性也具有审美价值。^⑤

理性优先论,尤其是第二种,即适度承认文学具有非理性特点的理性优先

① 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② 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③ 王元骧:《艺术创作中的意识与无意识》,《文学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4期。

④ 陶伯华:《创作迷狂与艺术灵感》,《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

⑤ 何西来:《论当代报告文学大潮中的理性精神》,《光明日报》1989年1月20日。

论,无疑具有其社会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表现出复杂性,其目标是两面的:首先,是反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极“左”倾向,反对抹杀文学的情感性,试图摆脱政治对文学的绝对控制,与整个社会的反极“左”思潮相一致。这种共识是普遍的,所以大部分论题的动机不是反驳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极为担心思想的失控,反对对文学作反理性的解释。总的来说,在这种观点中,对失控的担忧占据优先的位置。这就是一些观点提倡理性与感性统一,而最后把感性统一到理性中去的原因。

2. 非理性优先论

第二种观点主张文学的非理性倾向。持这一观点的人很少,但立场鲜明。刘晓波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1986年《深圳青年报》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报道了刘晓波的一次会议发言。他猛烈抨击了“新时期文学”,认为它缺乏彻底性,最主要的就是在反理性方面不彻底。“我的文学观就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任何理性因素的介入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文学的审美的纯洁性。在中国就是不能说什么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类字眼。”两者之间“是没法调和的”。“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①也许觉得这一观点太偏激,他后来专门撰文进行说明,表示这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和现状而言,西方的实证理性、思辨理性和宗教—道德理性分别对科学、哲学和信仰起到积极作用,是值得称赞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是无理性的;而从屈服于权威、政治看,中国传统中的理性又最发达,这种理性以压抑生命为前提。所以他说,在中国,要提倡“非理性审美观”。^②杨春时在探讨对现时的中国文学定性,即它究竟属于现代文学范畴还是近代文学范畴时,表达了他的非理性优先的文学观。他认为,理性规范压抑人性,是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在中国,道德理性是封建主义对个人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以理节情,文以载道,是封建文学的主要特征。“理性主义文学”压制了个人的自由想象和创造性。而近代文学虽然反对传统道德理性,却又接受了政治理性的支配。他提出,要以是否有非理性倾向作为判断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依据非理性倾向的有无和强弱,可将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国文学目前处于近代阶段,不具备现代性,因为还缺

①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② 刘晓波:《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百家》1988年第1期。

乏非理性精神。^①很明显,他是希望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这也意味着希望中国文学具有对文学非理性倾向的诉求。

这种观点的价值取向,是希望中国文学尽快打破陈旧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跟上世界现代文学的步伐,具有激烈的反封建态度。应该说,在现代性目标方面,它与此时期社会总的方向完全一致,只不过采用了在人们看来更激进的态度。

3. 折中论

折中论试图兼顾理性优先论和非理性优先论两种理论诉求,实际上是想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中非理性主义倾向与传统的强调文学要有理性的观点相结合。它既希望获得西方现代理论的好处,又不打算动摇已有理论的根基。具体说来,此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

第一种是主张平衡。平衡论的论证基本上是说,文学中既有理性因素,也有非理性因素;理性太强了不行,主张非理性过分了也不行。杨守森在总结20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时,批评了这些思潮过于强调非理性。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日趋强盛的理性权威固然压抑了人的自由本性,但如果任凭非理性本能的自由泛滥,也注定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因而提议应“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平衡”。^②

第二种折中论的真正意图是强调文学中非理性的合法性和积极作用,但为了避免争议性或掩其锋芒,所以最后用理性加以折中,提出的模式往往是转化(理性、非理性的互相转化)。陈传才对理性—非理性、意识—无意识的论证既涉及描写对象,又涉及创作心理。他认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中潜意识、无意识等心理情绪的描写,极大地深化了形象的生命意识,有积极意义。无意识和非理性是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因为创作是包含激情、欲望的实践活动,并不由清醒理性所控制,很多情节、细节都像是在意识失控下形成的。他提出一个三层面的意识系统模式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三个层面是:无意识、非自觉意识、自觉意识。他对它们作出的描绘相似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下意识、意识的解释,但他把审美意识等同于这三个层面的总和,其中无意识起内驱力作用,直觉、灵感、想象则属非自觉意识层面,是无意识与社会历史意识相互作用的后果。在这一模式下,陈传才指出理性与非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互相

^① 杨春时:《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并参见:杨春时《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② 杨守森:《二十世纪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反思》,《文艺研究》1996年第5期。

转化的,非理性是可以与理性相容的,在这方面既要纠正过去讳言无意识的僵化观点,又要批判资产阶级对此问题的歪曲。尽管折中,我们仍可很容易地辨别出他对非自觉意识的偏重。例如他指出,意识可以促发无意识,给其方向,但意识一旦建立便会失去非自觉意识的丰富性、生动性、鲜明性,成为保守的规范。而非自觉意识却是冲破旧规范、建立新规范的能动力量。^①姚文放把直觉、灵感、潜意识、幻觉、梦等概括为“文艺变态心理”。与陈传才不同,他赋予理性以中介功能,认为理性是文艺变态心理与社会生活相互联系、过渡的中介,正因如此,理性可以转化为文艺变态心理。为此他提出四种转化律:泛化律、凝缩律、补充律、诱导律。他担忧的是理性对文艺变态心理过于干涉,认为这不利于文学创作。他最后的结论是,对理性与文艺变态心理不能持任何极端观点,两者是相互转换相互生成的。^②

三、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与文论现代性

文学的理性—非理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集中提出,有其知识社会学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僵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被抛弃,整个社会在寻找一种新的生存基点,这就是人和人的现世生存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启蒙话语,它的口号是人道主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就是恢复物质生存的丰富,发展经济,召唤人情味,赋予七情六欲以合法地位。随后,又迅速出现了以突出行业特性和精英、专家作用为特征的专业化发展进程,消费社会和市民社会格局也很快形成、壮大。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媒介、因特网等新型通讯技术的普及,资讯时代的到来,后现代社会特征也逐渐显露出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经历了由启蒙话语,到专业界限严格的现代主义,再到效率优先和大众文化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特征的出现。文学在这个社会话语的现代性变动过程中经常充当先锋角色,例如“伤痕”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文学实验、新写实主义小说,这些叙事话语并不只在阅读领域中起作用,它们也是社会感受自身的方式。文艺学的学术讨论,因而就成了参与这一变动进程的一种话语实践。它为变动中的文学提供合法性论证,它本身也参与了社会现代性进程。

另一方面,文论本身的现代性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论虽也时处现代,但只体现了片面和个别的现代性性质(如缺乏自我

① 陈传才:《浅谈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光明日报》1988年1月15日。

② 姚文放:《理性与文艺变态心理》,《东岳论丛》1994年第2期。

